

# An Analysi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Xiaoyue Zhang<sup>1</sup>, Hengjin Cai<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sup>2</sup>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Email: zxy1992@whu.edu.cn, hydra6@gmail.com

Received: Aug. 1<sup>st</sup>, 2012; revised: Aug. 31<sup>st</sup>, 2012; accepted: Sep. 10<sup>th</sup>, 2012

**Abstract:** The vicissitudes of a nation largely depends on whether its wealth emergence can meet people's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From the eighth century BC to the second century AD, Roman had grown into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dominating Europe, Asia and Africa within more than 1000 years. However, she just collapsed within less than 200 yea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and territorial changes of Roman, it is found that the rise of Roman results from a synergic effect of both expansions and innovations as indicated by road system constructions and land distributions. In about 600 years, the population and territory had increased by 600 times and 6000 times respectively. As expansions and road system constructions reached their limits, overdraw from the future and religion practice became the dominant governing method to maintain the empire. However, when the wealth emergence mentioned above exhausted and al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stopped functioning, Roman Empire came to an end.

**Keywords:** The Vicissitudes of Roman;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Extra Supply

## 古罗马帝国兴衰原因探讨

张晓玥<sup>1</sup>, 蔡恒进<sup>2</sup>

<sup>1</sup>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sup>2</sup>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 武汉

Email: xyz1992@whu.edu.cn, hydra6@gmail.com

收稿日期: 2012年8月1日; 修回日期: 2012年8月31日; 录用日期: 2012年9月10日

**摘要:** 一个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的财富涌现能否满足人民的自我肯定需求。从公元前8世纪建城到公元2世纪, 古罗马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崛起从而称霸欧、亚、非大陆, 却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迅速瓦解衰败。本文通过分析古罗马人口和疆域变化, 从财富涌现和流转的角度探索其兴衰的原因。古罗马的兴盛缘于侵略扩张与自主创新如土地分配和道路发展的共同作用, 在600余年间实现人口增加600余倍和国土增加6000余倍的剧变。而当扩张逐渐停止、道路系统达到饱和后, 透支未来和宗教便登上历史的舞台, 成为维持帝国的主流方式。但无论财富如何增长都会有极限, 当财富供需失去平衡、宗教的力量无法凝聚民众时, 各种社会矛盾便相继爆发, 罗马便日渐式微, 最终走向灭亡。

**关键词:** 古罗马兴衰; 财富涌现与流转; 自我肯定需求; 额外供给

### 1. 引言

众所周知古罗马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 它上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罗马建城, 并随着公元476

年西罗马灭亡而告终。其间, 罗马由欧洲边缘一个不足15万人的弱小国家成长为吞并意大利、横扫地中海、称霸欧洲的耀眼帝国。

罗马非一日建成，从地缘小国到欧陆帝国，罗马在变革与转型中崛起；从公民间平均分地到大土地所有制取代小土地所有制；从对黄金的单一贮藏到制造通货膨胀扩大财政收入；从残忍打压基督教徒到政教合一；从民主共和体制到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元首制。期间罗马人口增长数百倍，疆域扩大数千倍。

对于古罗马的兴衰，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孟德斯鸠<sup>[1]</sup>认为罗马之盛是因为共和制度和开明法律等，衰则是君主独裁等造成。吉本<sup>[2]</sup>却认为是基督教毁了罗马帝国。M·罗斯托夫采夫<sup>[3]</sup>认为，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是以城市资产者的兴旺为基础的，城市的工商业和自耕农的经营使罗马帝国得到充裕的财政收入和农产品的供应；统治者一旦不注意维护这些资产者的利益，反而压榨他们，摧残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结果使得罗马帝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终于崩溃。威尔杜兰<sup>[4]</sup>认为罗马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锐减、道德风气败坏、阶级间的斗争、赋税繁重、战争频繁。

通过考察中国两千余年以及西方六百余年历史，蔡恒进<sup>[5]</sup>提出，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即为自我肯定需求。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是否得到适度的满足，正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大多数情况下，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大于其在社会的当下产出，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个缺口必须由额外的供给来填补。四种主要的额外供给方式有：学习和自主创新、外部获取、透支未来以及崩溃后的再出发。最近，邹恒甫<sup>[6]</sup>指出战争与机遇、对权力的渴望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技术进步、国内动乱和冲突等因素在民族崛起与衰落中起到重要作用，借助数学模型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与熊彼特理论结合对国家兴衰进行定量分析。

古罗马的成功在于政体演变和财富分配，宗教发展和军力增长的综合支撑，而财富的合理有效分配极大地决定了其它诸要素的正常运转。罗马由共和到帝制、由民主到专制并不是历史巧合，而是经过利弊权衡、多方博弈后的一种最优选择。但即便如此，古罗马最终还是衰败分裂，其原因并不单纯是末代君王昏庸无能、天灾人祸难以预见，事实上，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国家财富积累与国民自我肯定需求的

极大不平衡，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并持续激化，最终使得罗马帝国衰败倾覆。

本文将从人口变化、疆域、道路信息、宗教、土地财富分配、债务与通货膨胀等角度深入分析古罗马兴衰过程中，社会财富涌现与流转的变化特点。

## 2. 古罗马人口和疆域变化历程

根据古罗马的社会发展特点，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共和早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共和后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元年)以及帝国时期(公元元年~公元4世纪)。

### 2.1. 人口变化历程

据文献记载<sup>[7-16]</sup>，人口变化与战争和政策密切相关，总体来讲从共和前期公元前5世纪至帝国中期公元2世纪700年间，人口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从13万人增长至8000多万，人口增长了600余倍。古罗马人口在共和前期公元前5世纪至帝国中期公元2世纪700年间具有如下变化特点：公元前200年前后的波动期，并于公元前209年人口达到局部最低值，公元前85到公元前28年的第一个猛增期，公元前30年到公元14年的停滞期，公元14年到公元79年的第二个猛增期，公元175年公元2世纪初的第三次猛增，以及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初的骤降。

古罗马人口和国土面积变化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看出，古罗马人口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增长较缓，年均增长率约为0.3%；而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除开其中两个增长较为缓慢的停滞期，其余时间年均增长率普遍在2.5%以上，其中公元前85年到公元28年以及公元14到公元79年的两段时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9%和3.6%。

人口的两次下降均因战争。在公元前218到公元前216的三年间先后经历了的特雷比亚会战、特拉西美诺湖战役、坎尼战役并损失惨重，元老院损失将近30%的官员，人口急剧减少。此外战争导致粮食供应困难，粮价上涨数倍，加重了人民生活负担。但随后，由于罗马统帅于公元前210年小西庇阿攻占西班牙大本营——新迦太基城，并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获得巨额战争赔款，此时的罗马人口也相应开始回升。从公元前204年到公元前194年，也就是该时期人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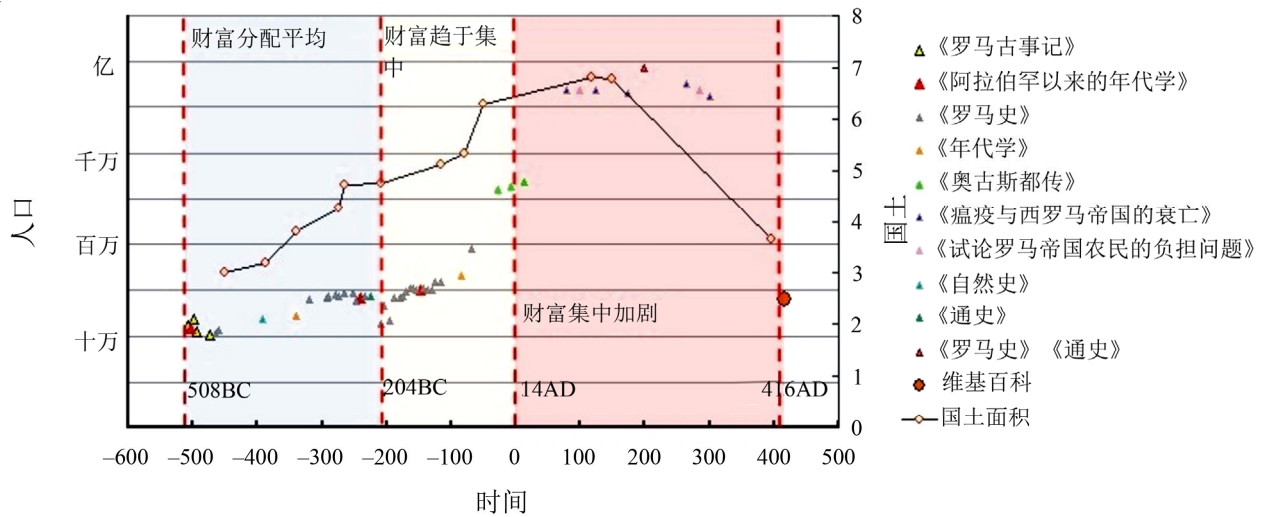


Figure 1. Evolution of Roman population and territory  
图 1. 古罗马人口和国土面积变化图

第二次下跌，罗马虽未发生之前的惨败，但马其顿战役中罗马与马其顿互有输赢，对人口的下滑产生重要影响，也正是因为没有重大战争损失使得第二次人口下跌幅度较第一次小。

人口增长共有两个明显时期，其中以公元 14 年到公元 79 的人口增幅最大，人口从 500 万人增加至 5000 万人，并于公元 2 世纪前后人口继续快速增长并达到顶峰。另一个增长期在公元前 85 年到公元前 28 年，本时期罗马正处于由共和向独裁统治的转变，先后经历苏拉(公元前 87~公元前 79)、凯撒(公元前 48~公元前 44)和屋大维(公元前 29~公元前 14)的独裁统治。这两次快速增长均处于罗马帝国从初步建立到鼎盛的上升时期，不同点在于：前者刚走出恐怖统治的阴影，帝国政治管理初步成型，元首制管理逐渐加强；而后者则由于元首政权社会基础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帝国处于全盛时期。

公元前 30 年至公元 14 年由于镇压反动势力和初步组建帝国形成宫廷政权，人口增长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期。

在共和前期，古罗马人口增速远小于对外扩张的速度，国家有充足的财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劳动得到超额回报，人民生活富足，社会阶层矛盾小，国家安定。侵略扩张带来的巨额财富是共和国发展的基础，也是民主制的正常运作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共和前期，民主制是有效满足自我肯定性需求的财富流转机制的表现形式。武力侵略则为这种流转机制提供

源源不断的大量财富。

## 2.2. 疆域变化历程

共和早期公元前五世纪，罗马的土地面积仅为 1036 平方公里，但到了古罗马鼎盛时期公元 117 年，整个帝国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南至北非撒哈拉沙漠，西起不列颠，北至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北岸，总面积达 650 万平方公里，在 600 余年土地面积扩大了 6000 余倍。

土地扩张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和公元前 80 年到公元 2 世纪。第一个阶段为共和早期，国家通过实行共和制极大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内耗减少从而有足够经历进行对外侵略，相继发动了统一亚宁半岛的三次战争、维爱战争、拉丁战争、三次布匿战争等；第二阶段为罗马帝国前期，帝国统治取代了早已腐朽不堪的共和国，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国土面积也继续扩张，并最终达到空前盛况。

公元前 30 年到公元 2 世纪，国土面积增速仅为 2.6%，而人口增速却为将近 3.6%，超过扩张速度一个百分点。同时，国土面积在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117 年，年均增长率为 1.4%，而公元 117 年到公元 395 年增长率则为 -2.6%。公元 2 世纪以后，首先是疆域迅速下降，其后人口在小幅上升后也随之下降。人口增速首次超过疆域增速的时间正好是共和制向帝国元首制的过渡时期。当领土扩张速度逐渐放缓，人口却依然高速膨胀。由于财富远不如往日充足，单一的元

老院无法应对庞大的国度，通过武力获取财富满足部分人的自我肯定性需求势必导致其余人的财富损失，社会矛盾随之激化，于是更加高效有力的统治模式——罗马帝国便取代了共和国。通过帝国的高效统治，罗马继续对外侵略，掠夺财富，从而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需求和财富的巨大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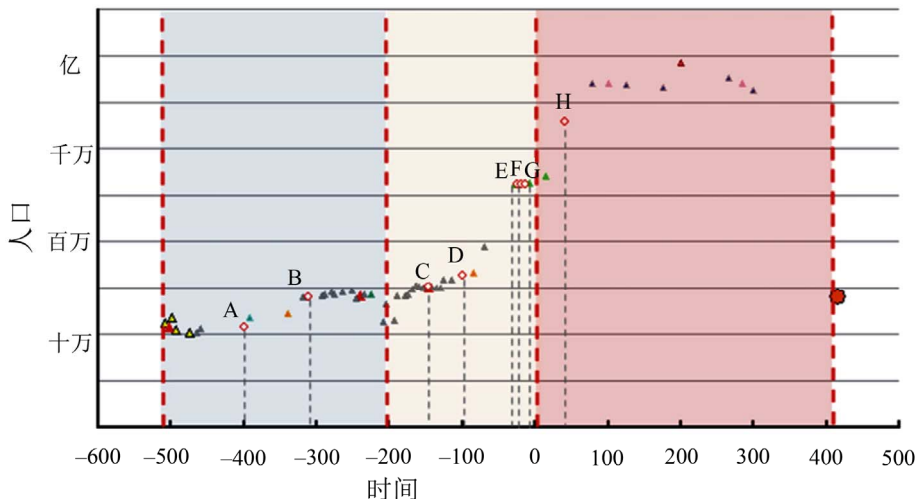
此外，从图 1 中还可发现古罗马疆域面积的变化走势与人口走势有着惊人的相似：两条线均经历了两次增长，并于公元 2 世纪左右达到峰值，随后迅速下降。其原因一方面古罗马通过对外侵略扩张增加领土，新增土地上原有的居民直接导致总人口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不管是共和早期还是帝国早期，辽阔的疆域背后都有国家强盛、制度完善、人民富足作为支撑，故而人口增加。

### 3. 完善道路信息系统

随着人口的增加、疆域的扩张，提高战争的制胜率是当时国家的一个核心目标，古罗马人的重大自我

创新之一——道路信息系统的建设由此产生。古罗马人高度重视筑路事业，国家元首奥古斯都(又称屋大维)亲任筑路总指挥。到公元前 1 世纪罗马的主要道路有 372 条，总长 8.5 万公里，覆盖了罗马境内每个区域，包括意大利境内的阿庇亚路、拉丁路、瓦莱丽路、弗拉米尼亚路、埃米利亚路、卡西亚路、奥列利亚路，以及意大利境外的多密喜亚路、伊格纳天路等。通过修筑发达的道路网，大幅提升了罗马物资和信息的传递效率，以及军队的战斗力<sup>[17,18]</sup>。庞大而高效的道路信息系统，从“条条大道通罗马”这句千古名句可见一斑。

同时，罗马人发明了信息网，通过设立驿站链，即道路上每隔 12 km 设一个驿站，并备有快马、信使以及马车和车夫，这进一步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使得罗马的情报传递速度远超同期其他国家，并在许多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为促进财富向罗马的汇集和涌现起到积极作用。人口与道路建设的对应关系图如图 2 所示。



- A 罗马为保障军队和军需物品的及时运输，积极修建道路
- B 建阿庇安大道，是当时罗马连接南部意大利的主要通道
- C 修建埃格纳提亚大道，是罗马第一条“东方大道”，将罗马与马其顿行省的主要城市、伊利里库姆行省连接在一起
- D 帝国内任何地区均有修建道路，道路系统日趋完善。在不列颠行省修建长达5000公里的道路系统。国家格外重视修建道路，元首奥古斯都亲自担任筑路总指挥
- E 建立信息网，道路上每隔12公里设有一个驿站，每个驿站备有快马、信使以及政府官员使用的马车和车夫，大大提高信息、物资传递效率
- F 通过修建“奥古斯都大道”，连接意大利与埃及。加强了沿海及沿途的军事征服，公元前6至公元7年，沿途46个部落被帝国征服
- G 罗马道路遍布境内任何一个地区，主要道路有372条，总长8.5万公里。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可能就是源于这个时期修建的大型道路网
- H 在高卢积极修路，整个高卢地区道路系统十分发达

Figure 2. Timeline of road constructions compared to population  
图 2. 与人口变化对应的道路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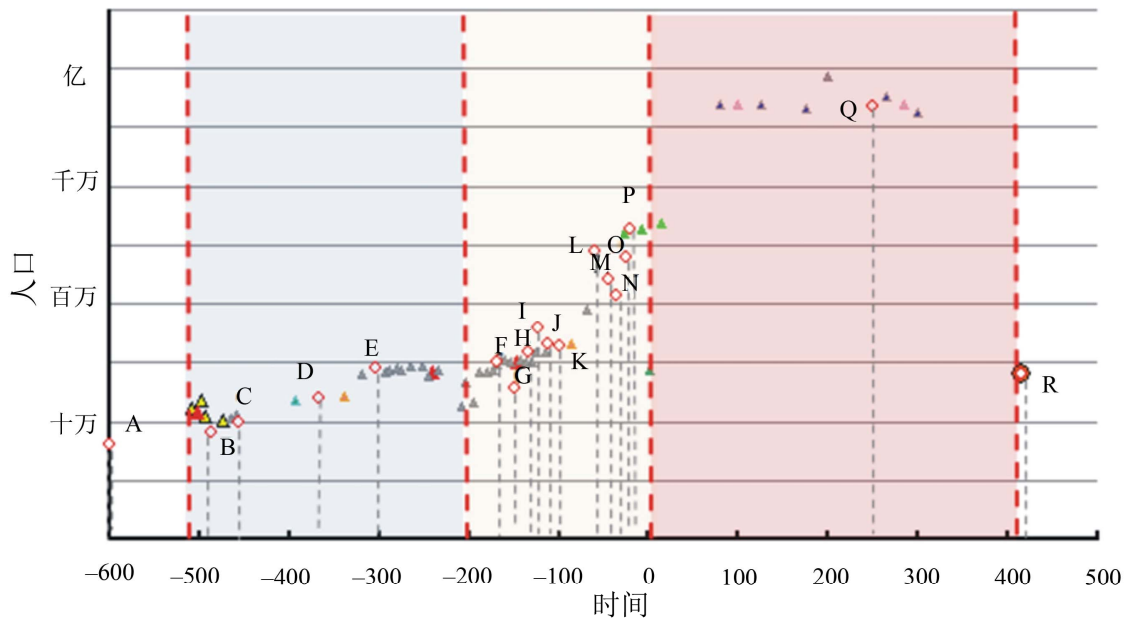
通过比较图 1 和图 2 可看出罗马的道路发展历程也和其疆域、人口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只是道路到达鼎盛规模的时间早于疆域和人口的时间。原因就在于道路系统发达不仅可以巩固已有的统治，也可以帮助罗马对道路所经之处的侵略进攻。建于公元前 13 年的“奥古斯都大道”便加强了罗马队其沿途地区的军事征服，并于公元前 6 年至公元 7 征服了沿路的 46 个部落。

古罗马人先进的道路系统是罗马人智慧的结晶，罗马也正是借助这一超前的技能成功驾驭欧、亚、非大陆上百年。依靠高效的公路网进行有力的对外侵略和对内统治，从而获得更多财富。实质上，建设罗马发达公路网的成功，是古罗马人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来满足罗马人不断增长的自我肯定需求，缓解社会压力。

#### 4. 土地等财富分配的变迁

古罗马地处欧洲边缘，在共和早期没有丰富的资源和强盛的国力，为典型人口小国，时时受到邻国骚扰和威胁。但当时的国家崇尚农业，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以田间躬亲劳作为荣，此时期罗马多次均分土地以保证财富回到普通百姓手中<sup>[18-21]</sup>如图 3，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得到满足，极大调动平民为国效力的积极性。

帝国中期公元前 2 世纪前后，罗马经过一系列征战，疆域迅速扩大，仅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前 150 年，国有土地几乎增加一倍。对于新增加的土地，国家将一部分分给平民，一部分卖给私人或租给罗马人或意大利人，对于战争中的荒地采取鼓励政策，让人们自由开垦。古罗马政府对土地的这种分配是政体上的一



- |                            |                             |
|----------------------------|-----------------------------|
| A 每个公民分得7优格土地              | J 通过保民官托里乌斯提出的法案            |
| B 执政官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的土地改革失败     | K 服役满7年的老兵每户分得100优格土地       |
| C 将土地分给平民                  | L 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以及退役老兵获得分地 |
| D 通过李锡尼-绥克斯图法，但从未被认真实施     | M 凯撒遇刺                      |
| E 多次对平民分地                  | N 多次针对退役老兵进行分地              |
| F 每个公民拥有20到30优格            | O 元首大肆敛财，收受贿赂达14亿塞斯退斯       |
| G 公民或同盟移民获得分地，每人30-50优格    | P 大土地所有制取代小土地所有制            |
| H 针对贫农进行分地，每户30优格，8万小农重新获地 | Q 贵族、利益集团大肆敛财               |
| I 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进行土地改革均失败   | R 土地完全被大地主占有，土地空前集中         |

Figure 3. Timeline of homestead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compared to population  
图 3. 与人口变化对应的财富流转与涌现图

种创新和改革，这种对新增土地的有效利用极大地促进了罗马社会经济发展。随着财富不断积累，人口便迎来了公元前 1 世纪左右的迅速增加并在公元前 30 年进入短暂稳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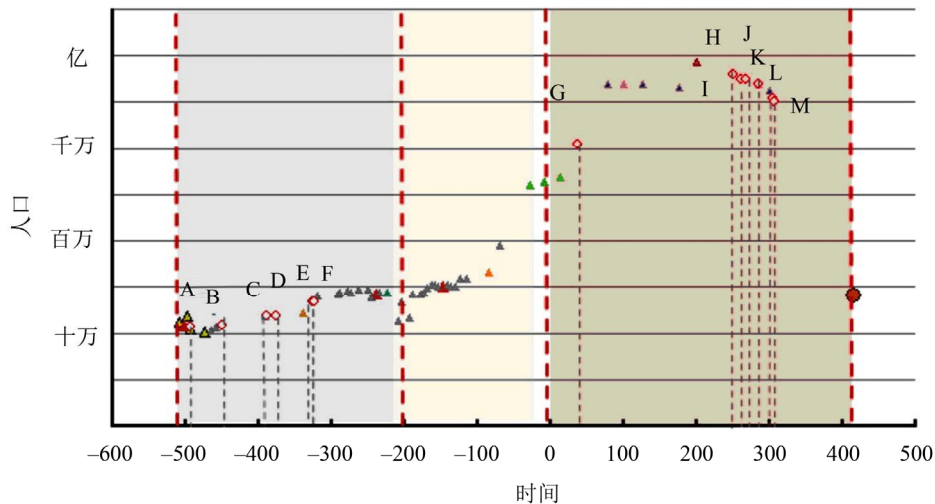
在第二个阶段中，随着国家不断的对外扩展，大批士兵的出现，财富的分配机制和占有状况发生重大转变。政府为了安抚士兵，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政权，国家财富的分配政策向武力阶层倾斜，于是大量土地开始分配给士兵、骑士而不是平民和百姓，甚至出现屋大维为解决退伍老兵安置问题不惜背离民意，牺牲原有土地所有者的现象<sup>[22-25]</sup>，普通平民的小额份地分配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士兵骑士的大面积分地，大中兴地产取代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国家腐败频频出现，由于共和时期内部机构过于简单导致对公有地监管力度不足使得贵族元老利用职权之便大面积侵占土地，且该现象随公有地私有化合法进一步恶化。国家所采取的外部获取一对外扩张策略获得的财

富，已不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便凸显并不断激化。

## 5. 借助债务和通货膨胀透支未来

当扩张、创新不能满足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这一矛盾时，统治者将会考虑通过透支未来财富来解决社会矛盾，其实金融手段、透支未来这些概念几千年前的古罗马人早就深谙此道了。为了保证借贷机制的良好运作，古罗马于公元前 326 年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虽然其中对于债务奴役制规定颇为残忍，但它作为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促使债务机制得以有序运行，对古罗马债务制度和整个古罗马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图 4 清晰地表现出古罗马人金融发展历程<sup>[26-28]</sup>。

公元前 325 年，古罗马开始铸造金币，结束了黄金仅作为储藏手段的时代。此后货币逐渐深入国家财务机制和社会经济发展，虽然罗马不断开采金矿，对



- A 平民因不堪忍受残酷的债务负担撤至圣山，给上层社会造成极大的恐慌
- B 颁布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极为残酷地规定债务奴役制
- C 黄金储备极少，且用于储藏而非作为支付媒介
- D 严重的债务压迫导致李锡尼、塞克斯都改革
- E 波特利乌斯法的颁布标志着罗马开始废除债务奴隶制
- F 罗马开始铸造金币
- G 古罗马帝国皇帝第一次采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扩大政府财政
- H 物价年增速为9%
- I 银币的贵金属含量为奥古斯都时期的40%
- J 银币贵金属含量降至8%，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 K 罗马帝国皇帝戴里克先改革币制遏制通货膨胀
- L 物价水平为公元260年的20倍
- M 发行“拜占庭金币”，纯度为98%，其重量和纯度在此后700年保持不变

Figure 4. Timeline of financial events compared to population

图 4. 与人口变化对应的金融事件图

外搜刮黄金，但用于制造货币的贵金属日渐匮乏。于是罗马皇帝开始调整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造成通货膨胀。公元 37 年到公元 68 年间的货币贬值主要目的是为了提提高国家财政收入，政府希望通过适度通货膨胀以增加税收。虽然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到后期，罗马皇帝无节制的肆意铸造货币，货币大幅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公元 304 年的物价水平为公元 260 年的 20 倍，公元 250 年到 284 年物价连年增速 9%。连年的物价飙升使人们对未来态势持悲观态度，人们更加关注当下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同时悲观预期对透支未来造成极大的冲击，继而在罗马后期造成金融危机。

此外，除开制造通货膨胀透支未来优化财富分配，古罗马统治者也会直接将钱财无偿赏赐给民众，

如凯撒便常常赏赐人民，数目多寡依时而定，饥荒时还会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或者无偿为灾民提供粮食；到屋大维时期，虽然赏赐额度有所降低，但人民仍然可以享受元首出钱举办的娱乐活动<sup>[16,17]</sup>。

## 6. 古罗马人的精神财富——宗教

人类的自我肯定需求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宗教作为古罗马人的精神财富的典型代表，当社会物质财富无法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宗教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以另一种方式弥补财富供求间的巨大缺口。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事实上在起初的 200 年中基督教发展步履维艰，期间针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也是触目惊心<sup>[29-31]</sup>。从图 5 可看出对于古罗马，宗教基本上属舶来品，甚至连古罗马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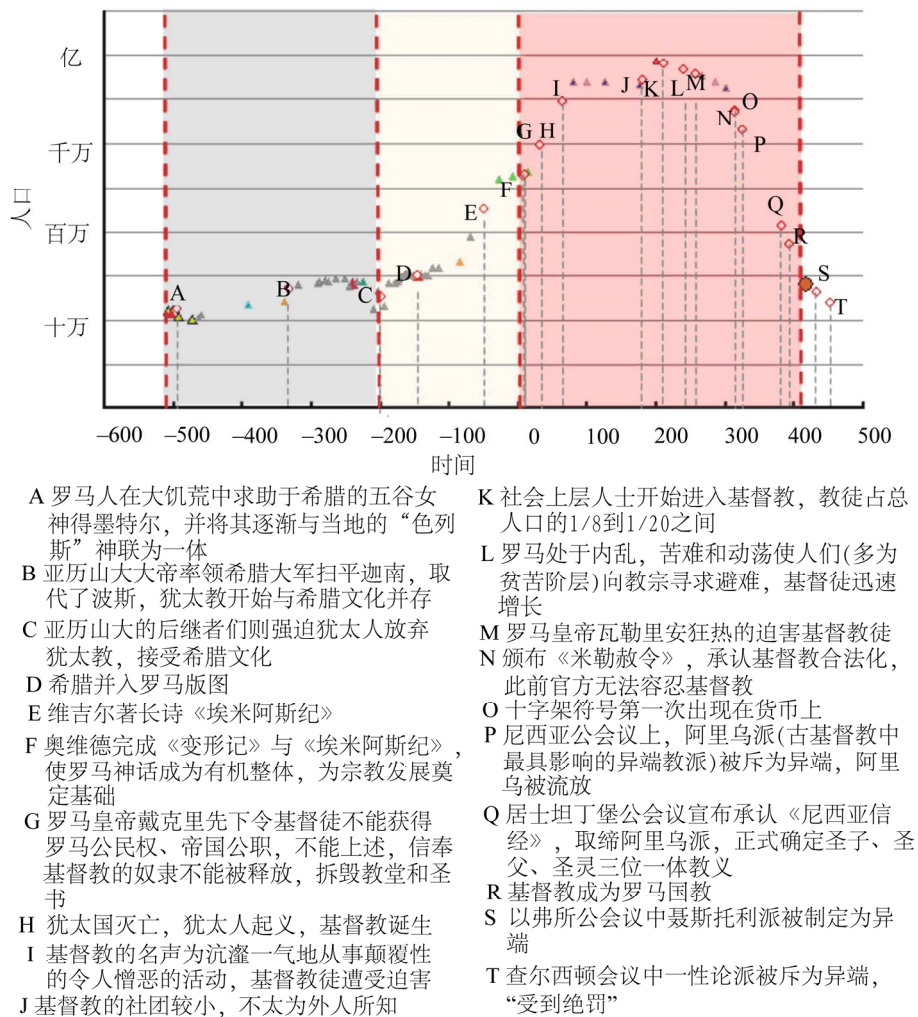


Figure 5. Timeline of religious events compared to population  
图 5. 与人口变化对应的宗教事件图

话也极大程度上借鉴了希腊神话。早在公元前3世纪犹太教便与希腊本土文化共存,相互影响,希腊在公元前146年并入罗马,使罗马与犹太教出现了更多地交集。到公元60年左右,随着一系列镇压活动的出现,民不聊生,基于广大人民极度痛苦的生活状况,基督教作为一种群众运动便诞生了。虽然后期统治者发现基督教是维持国家统一的极好方法,但由于对教义的误解、基督教自身的不成熟和统治者对影响国家统一势力的高度紧张,在基督教刚出现的时候一直不间断地面临各方迫害和打压。

图5中还显示出,针对基督教的赦令虽然使基督教遭受驱散和粉碎,却并没能实现帝国统一。事实上,从财富需求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基督教和统治者的契合点:统治者希望维持自身统治,维护社会秩序,这就需要足够的财富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财富相交时,统治者就不得不面对因物质财富限制而造成的社会矛盾,而宗教的出现让人们认识到精神财富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宗教的产生为帝国统治开启了一片新天地,因为同为人类主观意识形态的产物,欲望和信仰均属意识形态,都没有上限,通过宗教信仰驾驭臣民很好地克服了物质资源的局限性,从而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同样的情况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盛世唐朝的大兴佛教,以及在物质财富较为贫乏的雪域西藏,却通过藏传佛教平衡了人们对自我肯定需求的矛盾。

## 7. 结束语

纵观其发展历程,古罗马通过侵略扩张、修筑道路促进对外扩张、透支未来和发展宗教四种主要方式,多方面、多维度地实现财富汇集和流转,满足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但这四种方式在罗马发展中的作用却不尽相同。

侵略扩张和修筑道路对于罗马的作用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事实上,侵略扩张和修筑道路,二者密不可分。一方面,侵略扩张带来的财富为修筑道路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不断扩大的疆域所带来的信息与物资传递问题也极大地促进了道路建设;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道路网络也有力地推动了罗马的对外扩张。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公元2世纪末,是古罗马扩张最频繁也最密集的时间,前后历时600余年,占整个发展历程的2/3,远超任何其他方式的实施时

间。在此期间古罗马疆域扩大6000余倍,人口增长600余倍,并使罗马一跃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帝国。

透支未来和宗教均集中于罗马帝国逐渐衰败的后两百年时间中,它们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使帝国扩张和崛起,而在于维持帝国,延缓衰败。一定意义上讲,宗教通过向信徒许诺一个更美好的来世,也是一种变相的透支未来。蔡恒进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sup>[5]</sup>一文中并未提及宗教因素,因为在该文考察的对象中宗教因素并不显著。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 [3] 罗斯托夫采夫.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4]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 基督时代[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 [5] 蔡恒进. 中国崛起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J]. 财富涌现与流转, 2012, 2(1): 1-6.
- [6] H.-F. Zou. A naive model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and powers, 2012. <http://ideas.repec.org/p/cuf/wpaper/557.html>
- [7] 普林尼. 自然史(Pliny, Natural History)[M]. 剑桥: 哈佛大学, 1947.
- [8] 波利比阿. 通史(Polybius, Histories II, 24)[M]. 伦敦: 洛布古典丛书, 1960.
- [9] 苏联科学院编. 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M]. 北京: 北京三联出版社, 1960: 533.
- [10] 阿庇安. 罗马史[M]. 北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11] (古罗马) 题图斯·李维, 著. (意) 桑德罗·斯奇巴尼, 选编, 王焕生, 译. 自建城以来(第一至十卷选段)[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2] (英) 罗特威兹穆尔. 王以铸, 译. 奥古斯都传[M]. 北京: 国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13] 谢振玲. 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影响[J]. 学理论, 2009, 29: 30-31.
- [14] 李英. 试论罗马帝国的农民问题[D].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 [15] 宫秀华. 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人口普查制度[J]. 世界历史, 2001, 3: 117-119.
- [16] 王延庆. 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J]. 齐鲁学刊, 2005, 32(6): 60-64.
- [17] 杨共乐. 罗马社会经济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18] 宫秀华. 罗马: 从共和走向帝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9] 朱红. 试论古罗马早中期的农业发展[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 26(2): 81-84.
- [20] Dio's.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54.
- [21] 孙黎黎. 论所有权的历史流变——以民法法系为视角[D]. 西南政法大学, 2009.
- [22] 厉雪辉. 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初期的土地问题[D]. 内蒙古大学, 2006.
- [23] 张广智.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古罗马兴衰的启示[J]. 探索与争鸣, 1995, 12: 39-41.
- [24] (俄) 科瓦略夫, 著. 王以铸, 译. 古代罗马史(上下册)[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 古罗马帝国兴衰原因探讨

- [25] R. H. Barrow. *The Roman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49.
- [26] 阮崇晓. 黄金诱惑[M]. 重庆: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2011.
- [27] P. L. Bernstein, 著. 黄磊, 郑佩云, 译. 黄金简史[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 [28] 孙凌. 古代罗马金融贵族的兴衰[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 1: 61-63.
- [29] 王晓朝. 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30] 徐涛. 从精神文明状况看古罗马的兴衰[J]. 社会科学研究, 1981, 3: 11-15.
- [31] 聂病若. 古罗马帝国早期宗教状况[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2, 29(12): 9-10.